



旧文 旧史  
旧版本

倪斯霆 著

This vertical strip is a section of a Chinese newspaper from April 9, 1935. It includes several advertisements: one for 'Shanghai Film Studio' (上海影業公司) featuring a cartoon figure; another for 'Wing Yip' (永一) clothing; and one for 'Shanghai Film Studio' (上海影業公司) featuring a woman's portrait. There are also columns for 'Shanghainese News' (上海新闻), 'Shanghainese Pictures' (上海影評), and 'Shanghainese Advertising' (上海廣告). The layout is dense with text and illustrations.

旧文 旧史  
旧版本

倪斯霆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文旧史旧版本/倪斯霆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5476 - 0576 - 9

I . ①旧… II . ①倪… III .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  
民国 IV . ①K25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0351 号

策 划：黄政一

责任编辑：黄政一

封面设计：李 廉

## 旧文旧史旧版本

著者：倪斯霆

印刷：昆山亭林印刷厂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装订：昆山亭林印刷厂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版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邮编：200336

印次：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网址：[www.ydbook.com](http://www.ydbook.com)

开本：890×1240 1/32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字数：213 千字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张：8.5 插页 1

印数：1—2250

**ISBN 978 - 7 - 5476 - 0576 - 9/G · 416 定价：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 - 62347733 - 8555

# 序

张铁荣

晚清至民国通俗小说的研究，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应该说是比较薄弱的。记得严家炎教授曾经说过，现代文学史不讲通俗小说是“文学生态不平衡”的表现。其实在五四以前，通俗小说早就以白话的形式，风靡于市井书肆，读者群更是蔚为壮观。这个无可掩盖的现实我们不能忽略，所以不能因为提倡主流的精英文化，就埋没或轻视非主流的通俗文化，况且所谓“主流”也是个一时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证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论点的正确。

近年来情况有了一些改观，2010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旧人旧事旧小说》，一时间好评如潮。呈现在诸位面前的这本书可以说是《旧人旧事旧小说》的续集，它的作者是致力于民国通俗小说研究二十余年的倪斯霆先生。

我很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此前看文章一直以为他是从民国过来的老先生，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年富力强的研究者，同时还是业务、行政双肩挑的部门领导。

斯霆先生任职于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出版研究室，担任《书报文摘》报的总编辑。为了追求自己喜爱的这门学问，他在工作之余，日积月累、夜以继日，许多文章都是在八小时之外写成的。他的成绩足令我们这些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感到敬佩。

他有家学渊源，令尊是我国著名的曲艺理论家倪钟之先生，有《中国曲艺史》、《中国曲艺通史》、《中国民俗通志·演艺志》等多种著作。所以斯霆兄的文学功底从最初就起步于坚实大地上，他没有像我们那样的虚无缥缈和书呆子气。他为学认真，为人正直，文如其人。我曾听过他介绍关于自己在西南、西北旅行的经历，就仿佛走进一个大漠荒原或者是龙门客栈，那种淡定自若、客观分析形成一个强大的气场，就连细微的枝节也会使你神往不已。由于数十年来致力于民国武侠小说的搜集和研究，使他的身上不意间流露着一股侠肝义胆。

在民国通俗小说研究上，斯霆先生是当然的专家。民国通俗小说又分南北两派，北派的研究专家非斯霆先生莫属；而为了汲取南派研究的长处，他甚至让身在扬州大学文学院学习的儿子倪坦专程去听苏州大学中文系范伯群先生的讲座。当然此前他就与范教授有着多年的通讯联系。

为了兴趣和研究，他数十年来持之以恒、痴心不改，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生活中的斯霆先生。

这本书与上一册稍有不同的是，本书更偏重于事迹考证、作品考辨和历史寻根的研究。蒙斯霆先生不弃，使我有了先读此书的机会，我以为此书有这样几个特色：

首先，是选题新颖厚重、内容吸引人。

收在这本书中的文章基本都是精品，从内容和标题上看就对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比如《采菲录》：姚灵犀的“变态”之作——六十余年前“中国妇女缠足史料”出版引发的牢狱风波》、《天津通俗小说作家抢滩海上文坛——以天津“励力”与上海“正气”接力出版还珠楼主作品为例》、《宫白羽被张恨水招聘后的创作转型——〈世界日报〉成就了两位通俗小说大师的缘分》、《白羽武侠小说知多少》、《刘云若讥评“性博士”——兼说〈性史〉风波中的张竞生》等。一般的读者只要看目录大约不会轻易放下书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一试。

趣的读者一定是要先睹为快。这就是史料知识和论述技巧的力量，没有大量的史料积累，没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没有几十年的研究功力是写不出这等文章来的。斯霆先生以他得天独厚的综合能力，把我们带入了那个充满爱恨情仇、刀光剑影、奋笔直书、心潮汹涌的历史现场。

《〈采菲录〉：姚灵犀的“变态”之作——六十余年前“中国妇女缠足史料”出版引发的牢狱风波》是一篇很有学术含量的文章，它对于补充民国性学研究和缠足研究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在文化学术界，从弗洛伊德到霭理斯的理论，至今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对中国的相关理论家从张竞生到姚灵犀，我们却不予重视，甚至往往从很猥亵的角度来揣度他们。难怪连《中国缠足史》这样的著作都要出自日本人之手。斯霆先生高屋建瓴，既分析了文本由来又解释了事件余续，还对作者进行了客观的评判。

《从二贤里甩出的“金钱镖”——对武侠小说大师白羽故居的寻觅》一文，我以为是最有武侠气概的通俗小说作家研究。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区中山路的二贤里，是武侠小说圣手官白羽的故居。那神秘的胡同小院和青砖瓦房，其实距“觉悟社”旧址很近。在那个窗明几净的平房里，诞生了官白羽著名的《十二金钱镖》。我们读了斯霆先生的此文，再读官白羽的小说，我想读者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关于张竞生的《性史》风波大家都知道些，但是主流作家之外的通俗小说家刘云若讥评“性博士”并不是谁都知道的。经斯霆先生的史料介绍和细致分析，我们又可以回到那个争论的民国时代，在开放与保守、有度与无序之间，亦看出旧时文人与通俗小说家的风骨。

《中国武侠小说源头与流变考——从“侠”到“武侠”再到“武侠小说”》，是很有分量的小说理论史研究。为了厘清中国武侠小说的源头和流变，斯霆先生查阅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这是做实实在

- 旧文旧史旧版本

在的“学问”。通读此文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下功夫之大：从诸子到《史记》，从明清笔记到近现代相关史著，以及其他的研究著作等非常庞杂的阅读，都是此文的重要理论支撑。作者通过对大量作品的对比分析，得出我国武侠小说的源头出现在唐传奇中，其繁荣期始于民国的1923年，而武侠小说精品出现期则在上世纪30年代以后的重要结论。

我经常对研究生们说，要了解现代文学的全貌，除了读好的文学史以外，还是要认认真真地读作品，看改编后的电影和电视剧都不行，特别是不能看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把徐志摩糟蹋得不成样子；《我这一辈子》和《日出》的泡沫剧简直就是亵渎作者；《鲁迅》中有这样一个镜头：鲁迅和许广平走在夜色朦胧的旧北京，许广平说北平的夜景真美，鲁迅说景美人更美，许广平说先生你真坏！这样胡乱解构的表演真是令人喷饭。果然斯霆先生在他的这本书里，也给我们指出了通俗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存在的极大缺憾。

读这本书我们犹如跟着斯霆先生游走于民国市井的各个角落，事态民生、大小事件、国魂民情等伴随着通俗小说作家的笔墨，在作者的娓娓解读中，一股中国气派扑面而来。有许多的事情看似是旧的，但是在潜心阅读之后，聪明的读者会发现许多文章深处隐喻着无限的新意。这也就是那些佚事遗韵，为什么会在今天文艺创作与鉴赏中，仍被人们常常提及的原因之所在。

因此我们也可以，本书既是对于民国通俗小说的微观历史研究，同时也是对当今一些文化现象的宏观历史解读。

其次，是注重天津地域文化特色。

天津是斯霆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其兴趣所在秉性所及，自青年时代就搜集、积累北派通俗小说作品及资料，多次拜访京津诸多健在的文坛长辈与报界耆宿，并结识了许多通俗小说作家和他们的亲属、友朋，经过数十载披阅与采访，得出了天津是北派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的中心与大本营的结论。

斯霆先生令人信服地分析道：天津的通俗小说虽然起步稍晚，但是北派通俗小说由北入南以后，迅速风靡海上文坛，并以其质量高出一筹的水准，而使南派作品相形逊色，终将民国通俗小说创作推上了高峰。他认为通俗小说的绝大部分作者与天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或从天津开始写作、或在天津发表作品、或于天津创办报刊，甚至有些人本身就是地道的天津人。因此，称天津为北方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的中心并不为过。

在天津主持过《益世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先生曾经对斯霆说：“天津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许多作家、学者都曾在天津生活、工作过。他们的写作也大多是从天津起步，但作品却总是由外地出版，比如曹禺的《雷雨》。解放前天津的文化出版业很不发达。”这个观点一直影响很大，事实果真如此吗？斯霆先生用事实对沈老的这个说法进行了善意的纠正，他列举出当时天津的多种报纸副刊，这些副刊都连载过通俗小说，一时间蔚为壮观，令读者眼花缭乱。报馆出版通俗小说更是民国时期天津出版业的一大特征，因此对于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的梳理与评判，要将目光投向当时的新闻业，这种特色正是沈从文先生所没有注意到的，因为他毕竟是外地人。斯霆先生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研究，他认为：一方面是民国时期天津在新文学创作与出版上“不发达”，但另一方面此时期天津的通俗小说（与新文学相对而言）创作与出版却又是相当繁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吊诡现象。当然其前提是，要承认通俗小说也是文学。

民国天津报刊业纷纷推出通俗小说连载，出现了报纸与小说互动的状况，大量的通俗小说都是由各报连载后，再由该报馆出版单行本，这种状况成为民国时期天津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的一个特征。斯霆先生雄辩地指出：“这种特殊的出版方式带有很大的射利性与市场性。往往是报上连载的小说读者踊跃，报馆便解囊出书；而一些思想性较强、较严肃的‘文以载道’式的作品则因读者

寥寥而遭湮没甚至在连载当中便被夭折。这或许也是有人所言民国时期天津‘纯文学’创作不发达，反而出现一批可观的通俗小说作家与作品的一个原因吧。”

本书同时又是对当今一些文化、文学与艺术现象的历史解读。我以为它的读者应该是各种层次、诸多方面的，尤其是文科大学的研究生和教师，对这种书更是不能忽视。在阅读中我们可以知道通俗文学的机理，了解精英和学院派以外的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全貌，补充我们现代中国文学史阅读中的不足。特别是对于治新文学的人来说，读这样的书可以发现和克服新文学研究中容易出现的极端主义倾向；当然，读这样深层次的研究著作，还可以提示我们注意通俗文学中容易出现的媚世庸俗心态。

我虽是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大学教师，但是对于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实在是重视不够，因此也就常有好奇的学习渴望，长期以来为补不足，自己也偏重多读一些这方面的作品。对于此项研究当然是关注的，对于研究的专家更充满了尊敬，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读斯霆先生的这本书的。

他的文风简洁、论述清楚，毫无拖泥带水之处，这是与作者长期担任着《书报文摘》的总编辑不无关系；且本书还附有一百多幅书影和图片，翻检起来弥足珍贵，很快就会把读者带进历史现场，激发人们的想象空间。

我是这么简单想的，于是就说出来并求教于斯霆先生。  
是为序。

2012年2月16日  
于南开园范孙楼412研究室

# 目录

序 张铁荣	1
张元济与严复签下我国最早“版税合同” 从《社会通诠》出版看百年前商务印书馆是如何保护作者权益的	1
未入王国维年谱的《暑假歌》 从新学初兴时的“学堂乐歌”中品味出的“意境”	11
《采菲录》：姚灵犀的“变态”之作 六十余年前“中国妇女缠足史料”出版引发的牢狱风波	18
从报馆里涌出的市民文学潮 民国天津通俗小说勃兴原因与出版特征	28
培养民国北派通俗小说人才的三报馆 从《北洋画报》、《东方时报》与《商报》走出的“津味”作家群	46
天津书局：出版销售北派通俗小说的大本营 一个以左翼期刊起家因通俗小说扬名的书局获利史	59
天津通俗小说作家抢滩海上文坛 以天津“励力”与上海“正气”接力出版还珠楼主作品为例	69
宫白羽被张恨水招聘后的创作转型 《世界日报》成就了两位通俗小说大师的缘分	74

● 旧文旧史旧版本

报道施剑翘出狱真相的宫竹心	80
武侠小说大师白羽成名前的记者生涯	
从二贤里甩出的“金钱镖”	88
对武侠小说大师白羽故居的寻觅	
白羽武侠小说知多少	98
附：谨以此文为宫以仁先生送行	
刘云若讥评“性博士”	112
兼说《性史》风波中的张竞生	
镜头对准刘云若	128
从《红杏出墙记》与《粉墨筝琶》被搬上荧屏说起	
吴秋尘缘何在《北洋画报》上与刘云若“抬杠”	134
1928：两位“名记”笔下的天津墙子河	
刘云若笔下的天津大杂院	139
书页里的天津之一	
李燃犀小说《津门艳迹》里的“混混儿”	145
书页里的天津之二	
拉开民国武侠小说“大繁荣”序幕的《江湖奇侠传》	151
平江不肖生在现代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京剧连台本戏与武侠小说	173
被搬上舞台的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等剧机关布景揭秘	
中国武侠小说源头与流变考	182
从“侠”到“武侠”再到“武侠小说”	
子弟书奇才韩小窗身世之谜	212
民国舞台纪录片《宁武关》词作者生平与作品考	

“瞽矇”与中国历代说唱艺术 对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寻根	229
附录：倪斯霆的“勾沉功” 黄仲鸣	254
后记	256

# 张元济与严复签下我国最早“版税合同”

从《社会通诠》出版看百年前商务印书馆  
是如何保护作者权益的

距今百余年前，几位学习英文排字的工读生从上海教会学校清心书院毕业了。凭着自立创业的冲动与对现代出版印刷业的憧憬，他们集资3750元，在上海江西路创建了一家印刷厂。在此后的岁月中，这家在当时毫不起眼的排印作坊，由于顺应着开启民智的社会需求，迅速发展壮大，至今已成为有着多维经营取向的综合文化实体，成为一座为后人永世景仰的文化丰碑。他们推出的三万余种出版物，润泽培育了中国几代学人；他们倡导的科学文化启蒙，唤醒了沉睡经年的中华民众。

历史不应忘记这几位为中国现代出版业开辟草莱之人，他们便是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正是在他们的吹箫引凤下，随着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李伯元、杜亚泉、胡愈之、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周建人、王云五等一代精英的陆续加盟，终使小作坊变身为孕育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摇篮。

建厂伊始，几排破旧字架和几台简陋印刷机，虽然只能承印商业方面的账簿、表格及广告类印件，倒也顺应了商务日隆之上海滩的崛起，可谓出而逢时，应运而生。也正因此，身为鲍氏兄弟之姐、时任清心书院教习的鲍大姑便随口给这个印刷作坊起了个形象易记的厂名，曰“商务印书馆”。岂料这未经深思顺口而出的称呼，在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  
夏瑞芳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  
高凤池



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及总经理的王云五

此后的百余年间，竟名震神州，声贯环宇。对此，不仅命名之人鲍大姑料想不到，就是夏瑞芳、鲍氏兄弟等创业者也是始料不及。

商务印书馆对国人的启蒙与对国学的积累功不可没，这已是今天学界的共识——《最新教科书》、《简明教科书》、《共和国教科

书》、《实用教科书》、《复兴教科书》，犹如航标盏盏，在当年引导了无数国人走进科学殿堂；《汉译世界名著》、《严译名著丛刊》、《林译小说丛书》，像是把金匙，让封闭的国门首次开启，使国人系统地感受到域外文明；《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国学基本丛书》，好似国粹宝库，将中华文化尽收眼底；而先后杀青的“十大杂志”，更是在上世纪初叶出尽风头，誉满坊间。



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上海河南路口)



商务印书馆 1916 年出版的  
《共和国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 1904 年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

抛却出版物的辉煌不谈，商务印书馆在对出版科学的管理与运作方面，也堪称后世楷模。尤其是一些业务文本的签定，不仅在当年开一代风气之先，示范并规定了当时及此后的出版工作程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借鉴与参考价值。也正因此，在笔者保存的出版史料中，一份上世纪初“商务”人与当时学界才俊所签的契约便显得弥足珍贵，这便是在中国第一次出现的“版税合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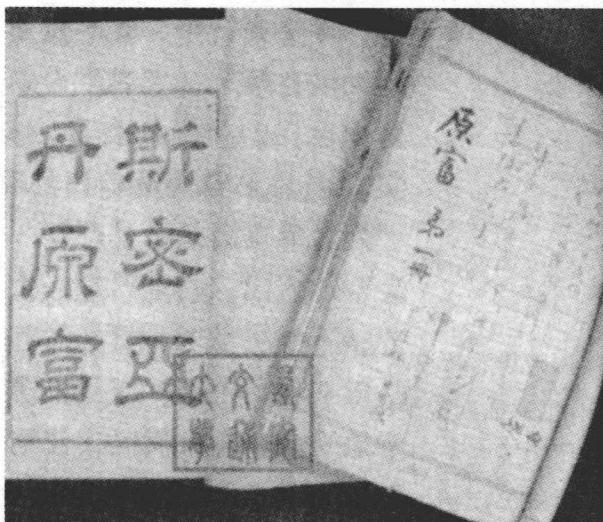
其签定人分别为当年的“商务”“在见”（见证人）张元济与译书“稿主”严复，而出版“印主”则为商务印书馆。时间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严复，1854 年出生于福建闽侯，早年曾赴英国求学于海军学院，在接受了欧风西雨的洗礼后，于 1879 年学成归国，历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与总办（校长）、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



介绍西方思想与文化的  
第一人——严复

身)校长、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及资政院议员等职。辛亥革命后，一度任北京大学校长。其译著主要有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孟德斯鸠《法意》等。说起他与张元济的相识与交往，那还要回到他归国后的第 17 个年头。



严复的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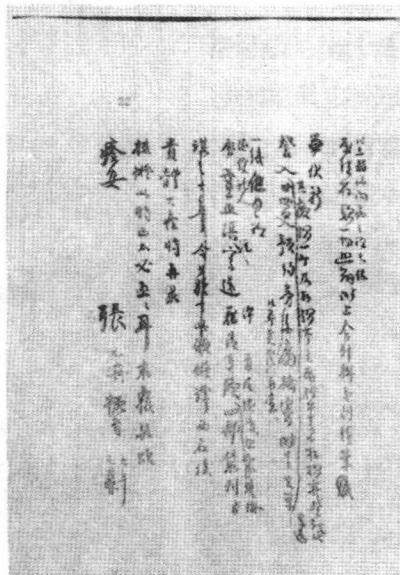
张元济摄于 1910 年环球旅行前夕

1896 年，小于严复 13 岁、进士出身的浙江海盐人张元济，在任总理衙门章京(文书官员)之余，与同人在京创办了一所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同年人在天津身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因参与酝酿维新，被李鸿章委派在津创办俄文馆并出任总办。机缘巧合，两位对学习西方有着共同志向的学界精英由此相识并结下了终身友情。据资料记

载,张元济所办通艺学堂的校名,便是由严复起名题写,而且严复还将侄儿严君潜派往学堂当教员。此外,严复在应张元济之邀为学生“考订功课,讲明学术”的同时,还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在通艺学堂发表讲演,阐述“西学门径功用”。虽然在此后的“戊戌政变”中,张元济因屡上奏折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而严复则避祸天津闭门译书,但两人的联系却从未中断。

被革职后的张元济,经李鸿章介绍南下上海任职于盛宣怀所办南洋公学附设之译书院院长。正是在此期间,西方保护作者版权之举引起了张元济注意。为此他多次与严复通信研究译书标准、品种及版权、稿酬等问题。如目前保存在上海图书馆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的 20 通严复致张元济的书信中,第二封信便有严复就专职译员每天的翻译数量和每日报酬、选定书籍及发人包译、包译的办法及报酬标准等问题答复张元济的内容。在此后

的通信中,严复更是多次谈到他翻译《原富》、《名学》及《群学肄言》的情况,并数次提到《原富》的版税问题,要求在书价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久之利益”。对此张元济除以 2 000 元价格买下《原富》译稿外,还允诺给严复二成版税。此举虽然是中国最早的版税实案,但并未产生合同,只是通信中的“君子协定”,因此很难受到法律保护,而且随后果然便发生了侵犯作者“著作权”问题。



民国九年(1920)元月五日张元济致严复信